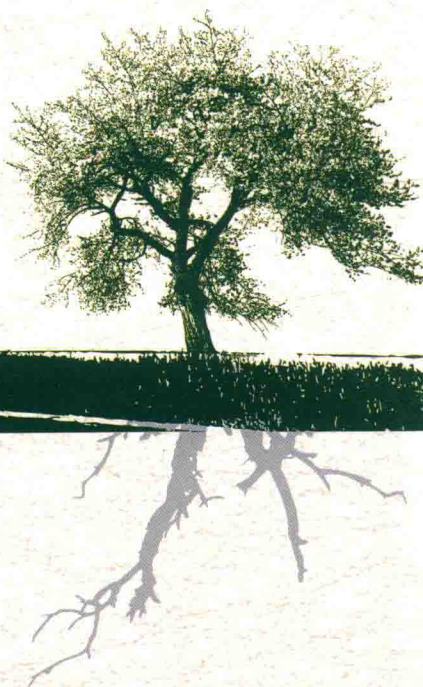


SHENGTAI ANQUAN DE XIANDAIXING JINGYU

生态安全的现代性境遇

罗永仕 著



生态安全是人类最根本的安全。重视并解决好现代性
境遇下的生态安全问题是当代人类的历史使命。



人民出版社

SHENGTAI ANQUAN DE XIANDAIXING JINGYU

生态安全的现代性境遇

罗永仕 著



生态安全是人类最根本的安全。重视并解决好现代性境遇下的生态安全问题是当代人类的历史使命。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装帧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安全的现代性境遇 / 罗永仕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740-6

I. ①生… II. ①罗… III. ①生态安全-研究 IV. ①X9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206 号



生态安全的现代性境遇

SHENGTAI ANQUAN DE XIANDAIXING JINGYU

罗永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6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4740-6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风险社会视阈下广西边境地区的生态建设研究”
(SK13YB054)
- 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基地项目“‘西进’式产业转移对广西生态公正的影响研究”研究成果(13MJ16)

序

把生态纳入安全的范畴，并以之为前提来寻求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延续的新的空间和机遇，几乎从来都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种基本动力。仅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千百年来围绕着长城这一分界线，在北方中国展开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反复交织的冲突与融汇，在某一维度上就正是出于生态安全的考虑或压力。因此，或许正如美国环境历史学家布莱恩·费根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几千年来如气泵一样变化的草原气候，使游牧民族一直不停地在大草原上奔波，并与南方的邻邦发生冲突。”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所谓的生态安全，其实并不是今天的新话题，而是漫漶于历史长程之中的老记忆。

然而，与悠然逝去的古代社会相比较，今天的生态安全问题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成动因和历史境遇，同时也包含了更为复杂而严峻的内涵、矛盾与后果。概言之，相对于人类历史上的那些区域性、地缘性的气候变化、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河流枯竭等等“小生境问题”，当代的生态安全问题不仅有着远为强大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内在驱动，有全球化所提供的更为广阔的时空影响范围，也有着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推波助澜，甚至还有因不同族群和区域在生存和发展上的顽强博弈而形成的难以消解的结构性张力。因此，今天我们再来谈生态安全，话题虽然还是老话题，但由于时空的变换和境遇的不同，实际上已经是老瓶子里装了新酒，甚至简直就可以说是新瓶装新酒了。应当说，罗永仕的博士学位论文

《生态安全的现代性境遇》，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获得选题灵感，并在试图追求一种把新酒装进新瓶子里去的目标中起步的。

现在回想起来，鉴于我本人的研究方向偏重的是科技哲学这一学科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方向，而他本人又来自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因此，在为他选定这一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对他的要求是，既要力求从理论上为生态安全问题提供一个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分析框架”，也要着眼于自己的家乡这一熟悉的生活实践环境，尤其是要努力结合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生态问题及其特殊性，努力地在生态安全问题的科技哲学分析上实现某种“深描”，从而既体现科技哲学的学科规范特色，又呈现当代中国的科技哲学的独到问题意识。如今，看到这篇经他反复修改并充实了不少新内容的博士论文稿的出版清样时，我以为，当年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实现：

首先，以对生态安全问题的演变历史的梳理为切入点，以经由贝克、吉登斯等人所建构出来的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观察视角和分析资源，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科技、制度与文化构成的三维分析架构，无疑是有新意的。这样的一种分析架构的提出，不仅敏锐地把握住了当代生态安全问题的理论实质和实践指向，也扩展了我们对生态安全问题的理解空间，有助于人们能够从包含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消费文化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把握当代生态安全问题的复杂内涵和功能后果。就一篇以科技哲学为取向的博士论文来说，这样的一种理论建构是必要的，也是有新意的。

其次，把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分析纳入民族地区所面临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之中，从中既呈现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与关联性，又显示维持和建构具有在地特色的民族生存发展空间的重要性，更是这篇论文值得肯定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很多时候，学术界对于生态安全问题的分析论说，其实是在有意无意地沿着西方现代性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的某种“跟着说”，这样的“跟着说”虽然有其学术研究范

围内的价值，但对于分析和解决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则显然有不免过于抽象且离题太远的缺失。而小罗的论文由于引入了民族性的视角，这就使得我们既可以在思考区域中国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时获得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资源，也可以反过来检视风险社会理论自身得以形成的特定区域实践基础和价值立场，从而获得一种对于那些“宏大理论”的清醒认知和反思能力。我认为，这就不仅是一种跟着说，更是一种“我在说”，是一种努力追求具有中国特色生态安全理论建构的学术自觉。

当然，相对于这篇论文所取得的成绩来说，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克服这些问题的途径，无疑需要在理论分析上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以便形成和所研究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相对应的认知能力。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一条路径或许在于，如果能够沿着生态安全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调研，以对现实问题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为指向，以对民族地区在追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生态问题的实地踏勘和民族志记述为基础，或许就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具有地缘文明特色、同时也是更具有自主话语权的生态安全理论。

鉴于此，衷心希望如今工作生活在自来就有“十万大山”和“山水甲天下”美誉的广西的小罗，能够沿着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方向作进一步努力，既以之作为学术的追求，更作为人生的志趣。

是为序。

冯鹏志

2015年3月30日

目 录

序	001
导 论 重视并解决好现代性境遇下的生态安全问题， 是当代人类的历史使命	001
第一章 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内涵演变	006
第一节 生态安全的概念	007
第二节 生态安全的内涵	020
第二章 生态安全的历史演化与当下问题	031
第一节 生态安全诉求的历史差异性	033
第二节 前工业社会的生态安全诉求	037
第三节 工业社会的生态安全问题	046
第四节 生态安全遭遇的现代性悖论	052
第三章 生态安全解构的科技之维	070
第一节 现代科技的双刃剑作用	071
第二节 科学对生态安全的解构	096
第三节 技术对生态安全的挑战	111
第四节 社会技术工程的非理性构成	130

第四章 生态安全解构的制度之维	142
第一节 制度的本质及其功能	143
第二节 制度设置的博弈及其生态影响	148
第三节 风险的制度化与制度化的风险	157
第五章 生态安全解构的文化之维	170
第一节 生态安全问题的社会建构	171
第二节 文化断裂的生态风险	178
第三节 消费文化与生态安全问题	193
第四节 “个体化”社会与生态安全	205
第六章 生态安全的“后现代”探索	216
第一节 科技的“绿化”	217
第二节 生态政治建设	226
第三节 全球风险文明	235
第四节 “重新嵌入”：个体化的应对	242
第七章 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的实证研究	246
第一节 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的当代意象	247
第二节 城镇化与生态安全	256
第三节 产业转移与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广西案例	261
第四节 构建民族地区生态安全	271
参考文献	282
后 记	291

导 论

重视并解决好现代性境遇下的生态安全问题，是当代人类的历史使命

时局变幻，灾难迭起，人类似乎变得愈加惊慌失措。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或世界，安全问题如影随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新的安全观念逐渐形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传统的安全概念主要局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当前世界的发展则要求我们对国家安全观念、安全范围和安全目标进行扩展，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安全拓展到经济、科技、生态、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中，随着现代工业的全球扩张，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凸显，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的目标。

生态安全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提出与生态危机相关。人类生存依赖于地球上良好的生态条件和自然资源，然而现在，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遭受严重损害，资源已经过分消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下降，人类健康风险指数不断上升。这些现象被称为生态危机问题，又称为生态安全问题。同时，民族国家之间、国际间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广泛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争端和战乱也逐渐围绕着生态环境展开，对人类生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和警告，回答“多少算够？”的疑问非常必要，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

问题。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与频发的生态危机问题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危机的凸显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有的人把现代社会日渐严重的生态危机归因于部分社会利益集团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有的人将此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盛行，亦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的疏忽而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日渐严峻。这些说辞似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细审之余又暴露出局限性与表面性的缺陷。现代社会积重难返的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如加拿大著名生态哲学家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当前所遭遇的生态环境恶化似乎是人与自然对抗的结果，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在一个资源相对有限而欲望无限的世界中，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支配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发与支取自然资源的“时不我待”最终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恶性掠夺。莱斯认为是人类在掌握了科技理性并肆意挥舞这一智慧之果才导致了自然的变局，然而，科技层面的分析无法解释人类为何疯狂盘剥自然，也无法触及这种疯狂行为背后所掩藏的原始驱动力，正是这种力量导致人际关系的扭曲。

要厘清人与人之间的非理性关系，就必须透过流变的表象，立足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去审视。从历史的视角看，人类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并非一日之寒，无论是在人类发展的起始阶段，或是在现代社会时期，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客观规律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如何消除来自自然界的制约与威胁，同时谋划着使万事万物为己所用的历史。但不同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的形式上与本质上表现出历史差异性，前现代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现代社会有着天壤之别。

在人与自然抗争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凭借无与伦比的智慧发展出越发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自然界形成了日益强悍的干预乃至操控。人类的技

术对自然界“非常态”、强力的介入,越来越多地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能量转化与信息传递,使其逐渐趋向人化的轨道。在人类大肆介入之下,自然界自我运行规律与演化规律受到扰动,导致了种种不可预测的后果,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因而也遭遇到难以预知的威胁。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进千里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现代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推波助澜,人与自然的对立更是被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端状况,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1999)中所言,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也不管我们是如何有权有势或者一无所有,许多新危险和不确定性无不对我们产生影响。现代性镶裹了人们的一切,并且带来了诸多令人无奈的悖反: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则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富有与恐慌逐渐占据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有心为之”,生态安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境遇下开始了它的历史性出场。

首先,生态安全问题是作为现代性之负面实践效应的反题而出现的。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现代社会运动和自我意识,肇始于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重新发现^①。启蒙运动通过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唤醒推动了人类对自我意义的重新发现,同时发现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与作用。自此以后,伴随着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展,人类不仅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由于对这种工具理性所取得的成功过度痴迷,最终将理性定格在获取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机巧之上。其结果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及现代化过程,人成了手段,技术反倒成了目的。自工业革命以

① 之所以说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人类的理性,是要区别于有的学者所表述的“‘启蒙运动’发现了人类的理性”。本书作者认为,理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化,其多元化的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中一直存在,只不过是中世纪被神学蒙蔽了。另外,人们对“理性”的界定也各执一词,即使是把理性理解为现代性,多元化依然存在,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便根源于此。忽略了“重新”意味着认同理性乃欧洲历史所独有,否定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

降，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大为增强，第一次真正得以成功地摆脱自然的原始束缚，逐渐从对自然力量的恐惧转变为对自然的肆意蹂躏与盘剥。然而，现代化进程在帮助人们实现改造自然、改善物质生活目的的同时，也将大自然弄得满目疮痍，严重侵扰了自然界的自我生息，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现代工业迅速发展及其全球化扩张、世界范围内的战火逐渐平息以及经济的复苏等背景下，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担忧得以解除，在经济上不甘人后成为各国当务之急，从而加快了对自然的索取，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与之相应，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生存空间不足等问题不断袭来，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的深层次、全球性的问题。更为堪忧的是，在日益一体化的当今世界里，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影响的已经不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自身，整个世界均可能因此而受到波及和伤害。

其次，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还在于现代性之文化反思浪潮的兴起。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整个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威胁，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普遍忧虑，也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反思运动。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作为现代性之基础与核心的“自由”与“理性精神”开始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以生态环境危机形式显现出来的生态安全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科学领域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紧密相关的复杂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恰好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得以彰显的自由、民主思想与现代理性精神的结果。自由与理性的精神作为现代性两个最基本的维度，本来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强大力量，现在却成了导致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科学技术是人类追求自由与理性精神之典范，因为它们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力量，是人类谋取最大限度福利的可靠保证。为了保证科学技术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尽可能多的好处，人类不仅发展出一整套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体制，试图将所有的行动都统摄其中以实现“有效

性”或是“有序”，而且通过现代文化的建构与塑造，在文化意识的层面上构筑了科技主义的内核，形成对“效率”的极度痴迷与对科学技术顶礼膜拜的强大气场。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为新的宗教，成为摆弄人类本性的统治者，而且直接地制造了人与自然的极度对立关系——生态危机。

总的来看，现代性在解放和扩展人的主体地位和理性能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套上了枷锁。自反性特征不仅使现代性自身成为一个悖论，也使得生态安全问题被置于关系现代社会能否继续生存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位置。现代性是当今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成，关注并解决好现代性境遇下的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的历史使命。

第 一 章

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内涵演变

“安全”是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蕴含着不同的内涵。唯一不变的是，安全问题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它无论是对于个体、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具有基本的现实意义，是从古至今全人类社会所极力追寻的，如同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一样。有所不同的是，一方面人们对安全内容的理解与追求因时而异，也因地制宜；另一方面，安全还在主观层面上体现出群体差异性。但尽管如此，就整个族群或人类而言，始终不变的共识是：安全第一。

安全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扩大。无论是本书中的生态“安全”，还是其他领域的“安全”，其内涵都有了新的发展，从主要关注生命伤害与物质财产损失这些显性的安全扩展到对更隐性安全的关注。比如说，职业安全、基因安全、文化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等等，都被视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安全内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经济安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被所有的国家高度关注，而作为经济安全与整个社会安全之基础的生态安全自然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安全逐渐从之前隐蔽的角落走出来，成为现在备受关注的主角。因此，审视生态安全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准确理解其内涵的基础。

第一节 生态安全的概念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生态安全的提出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它的出现必然地依赖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以及现实条件。因此,系统地梳理生态安全理论的渊源和科学合理地界定生态安全的概念,是研究生态安全问题的逻辑起点。特别是在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最流行语词的今天,要准确把握生态安全的概念,就需要对与之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辨析。

一 环境安全与生态安全

如果从最宽泛的意思来理解,那么,生态安全的问题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了。但是严格地说,前现代社会的人类并没有主动的生态安全意识,他们通常将局部、直观的环境问题等同于生态安全问题,^①干旱、洪水、火山以及地震等等,都被理解为不安全的因素,即狭义上的自然环境安全。这种理解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现代社会的生态安全所包含的含义要广泛得多。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凸显和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安全作为一个概念被提了出来,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几年的时间,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正因如此,人们对“生态安全”的理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安全(safety, security)源自拉丁语(securus, securitas, segura),是由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和卢克莱修提出来的,最初意指人类哲学和心理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人们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主观感受。安全的最基本含义是:人类感觉上的“不难受”。汉代焦贛《易林·小畜之无妄》:“道里夷易,

① 之所以称为“局部”,一方面是指前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法把握超出其所处社会的各种灾难,另一方面则指他们尚无法将灾难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进行普遍性的联系,尤其是不能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活动对这些灾难的影响,而是把它们看成自然界在局部区域内的反常。

安全无恙。”《韦氏大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安全，即指人和物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没有或不受或免除了侵害、损伤和威胁的状况。依此看来，安全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人类个体或与之相关的事物之“安”，即不受威胁而处于稳定；二是指人在主观感觉上的“全”，即所关注的人或事物处于完整状态。

与“安全”概念的双重含义相比较，“生态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则要复杂得多。虽然人们现在经常使用“生态”一词，但是受到“环境”一词的干扰，对如何界定两者的异同仍感棘手。1868年，德国植物学家俄涅斯特·海克尔（Ernest Haeckel）首先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术语，他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为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概念性框架。它不仅创立了一门新的生物学科，而且把环境因素纳入生物学研究。海克尔认为，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外部世界是指广义的生存条件。表面上，海克尔的生态学概念指示了“生态”与“环境”的区别，但其所谓的“生存条件”实际上却给二者的混用留下了机会。现代生态学的核心概念“生态系统”则是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 G. Stanley）在1935年提出来的，其定义使得生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明确。他在《植物生态学导论》一书中说，“我们对生态系统的基本看法是，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它们的环境分开，而与它们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系统。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们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各个部分——生物与非生物，生物群落与环境，可以看作是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因素，而在成熟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因素接近于平衡状态，整个系统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以维持。”^① 美国的查尔斯·哈珀（Charles

①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